



人民军队的第一批女兵

陈升

1927年8月1日,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、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。

硝烟弥漫的战场上,闪现着一群英姿飒爽、青春昂扬的女兵们。她们活跃在革命队伍的一线上,英勇无畏、一往无前。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称呼她们为“女将们”。她们是我军建军以来人民军队中的第一批女兵。



1927年2月12日,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非常特别的一天。国共合作创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(又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),在这一天举行开学典礼。183位穿着灰色军装、戴着灰色军帽、紧束皮带、打着绑腿的女兵,醒目地站在队列里。

同一天,在汉口四维路五号开办的妇女政治训练班(又称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委训练班)正式开学,宋庆龄担任训练班主任。训练班以训练妇女政治能力、培养妇女干部为目标,号召妇女参加革命,培养妇女革命军。后来,从“女生队”和妇女政治训练班走出了一批如赵一曼、胡筠、张瑞华、彭援华、刘志敏等赫赫有名的巾帼人物,成为革命事业中的妇女骨干。

南昌起义中的女兵共30余人,她们大多来自中央



8月1日,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,贺龙、叶挺、朱德、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两万多人,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。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,全歼守敌3000多人,占领了南昌城。根据中央原定计划,起义军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,南下广东。

谭勤先等11名“女生队”女兵随军从武汉乘船赴九江,与第11军政治部的的女兵周铁忠、苏同仁等会合。7月30日晚,女兵们随队冒雨翻过庐山,由狮子岭抄近路南下鄱阳湖,在星子换船,沿赣江偷渡去南昌。得知起义军去向,在接近南昌时,女兵们在军服外罩上印有红十字记号的白大褂,于李家渡上岸,步行至抚州与起义军大部会合。

在抚州,贺龙率领的第20军中,也陆续集结起了一支女兵队伍。除了随第20军赴南昌参加起义的女兵何柏华、陈兆森等,王鸣皋、杨庆兰、孙格非等女兵,历经千难万险,终于在抚州追上第20军的队伍。

“女生队”解散后,女兵王鸣皋被分配到第二方面军军医处当卫生员。她随队到达九江后,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便下令缴械,开始在部队“清共”。王鸣皋等及时召开党员紧急会议,决定秘密出发到南昌寻找贺龙率领的第20军。他们一共10多人,其中5名女兵,于当日下午出发,辗转跋涉,于8月5日到达南昌。此时,起义军已经南下,他们随即向南追去,沿途不断打听消息,终于在抚州赶上部队,找到第20军第1师政

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“女生队”,少数来自妇女政治训练班,被分派至南昌起义各部队,担任宣传或救护等工作。南昌起义中的女兵队伍并不是同一天集结完毕的,也没有特别的称谓和独立编制。除少数几人较早加入部队工作外,大多数如散落在各处的星星之火,自发奔赴南昌起义军。

1927年6月15日,妇女政治训练班结业,许多毕业生决心深入到军队、农村等革命一线中去。“七一五”反革命政变发生后,革命形势急转而下,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“女生队”解散,“女生队”中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不愿离队回家的女兵,一部分被分配至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和贺龙率领的第20军,另一部分编入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,以及第二方面军军医处等。女兵们奔赴四面八方,走上各自的革命道路。

治部。女兵杨庆兰、孙格非等在随军校野外演习途中,得知了南昌起义的消息,经过几天急行军,也在抚州追上了起义军,加入第20军宣传队。

宣传工作是女兵们随队南下途中的一项重要任务。为了让百姓了解共产党的革命任务和政策主张,女兵们常常走上街头,通过张贴革命标语、发表演讲、自导自演文艺节目等方式,开展宣传工作。书写标语、走上街头张贴是吸引群众、开展街头宣传的好办法。女兵们在路边书写“打倒军阀”“开展土地革命”“工农革命万岁”等标语,四周便聚拢来围观的群众。标语写完了,群众也集合好了。女兵们站在凳子上,高声演讲,宣传党的土地政策,号召农民参加土地革命斗争。

为了增强宣传效果,女兵们还自编自导自演文艺节目,其中彭援华编排的《老母亲念经》备受欢迎。《老母亲念经》讲述了江西乡村的一户农家原本过着安定的生活,因受国民党军阀压迫而流离失所、生活凄惨的故事。节目反映了人民生活的现状,揭露了国民党对百姓残酷的剥削和压迫,号召百姓行动起来开展斗争。女兵们以真实生活作为创作蓝本,用生动逼真的演出,让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产生了共鸣,引发热烈反响。

8月,正值盛夏酷暑,女兵们每日都要随队行军走上八九十里路。经过十多天的行军,女兵们脚上都磨起了水泡,却没有一人掉队。向瑞金进军时,在壬田遇到涨水,为避免与敌遭遇,部队走小路前进。这一路都是涉水前行,一走就是一天一夜。夜里涉水行走困难,女兵们滑倒在水里又相互拖扶起来,就这样一直向瑞金方面奔走。



起义军经过一个月的行军战斗,减员近万人。中共前委决定改道经福建长汀,再沿汀江、韩江进入东江地区。队伍向福建汀州出发时,王鸣皋等女兵留在瑞金照看伤员,王鸣皋担任护士长。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,救护工作十分困难。有的伤员负伤失血过多,急需抢救输血;有的身上有弹片,急需开刀取出;有的需及时消炎,防止伤口腐化和感染恶化……由于条件有限,女兵们只能极尽所能为伤员们治疗,鼓励他们和伤病作斗争。待把需要住院治疗的伤员都移交给汀州医院后,她们才整装出发,再次奔赴起义军。

杨庆兰、何柏华、谭勤先等女兵跟随起义军南下到潮、梅地区,在枪林弹雨中传送命令、运送弹药,直接参与战斗。女兵们还积极动员当地群众支援起义军。在东江地区,绝大部分妇孺老人都留守在家,占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二。大革命兴起后,妇女们是当地农会的主要成员。在女兵动员下,妇女们主动为部队担米、做饭、送水。战斗最为激烈时,女兵们把数百名妇女组织起来,侦察敌情、运送弹药、救护伤员,发挥了重大作用。

起义军占领潮州后,为进一步掌握敌情,革委会派胡毓秀、谭勤先和苏同仁等到邮政局、电报局收发情报。谭勤先在执行任务中负了伤,她们和部队失去联系。在医院工友的帮助下,她们三人在挂着“女厕所”牌子的房间里躲了一个星期。谭勤先伤好以后,一位医生为她们换了便服,让其充当医院的看护,照看在医院里养伤的起义军伤病员。后来,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,她们三人离开潮州,经汕头乘船前往上海。

起义军到达潮汕后,敌众我寡,作战连连失利。女兵们根据组织安排,一部分在潮州红十字会的医院里担任护理员,后来乘船转移到上海;周开壁、曹泽芬(又名曹泽之)等女兵随队到了海陆丰地区,加入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;彭援华、肖凤仪等女兵随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余部,转战于闽粤赣边界。进入赣南地区后,环境越来越艰苦,朱德派人与武汉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,动员女兵到武汉做地下工作。随后,这批女兵几经周折到了武汉,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。

南昌起义军中的女兵们,是人民军队的第一批女兵。周恩来曾对女兵们说:“女将们,你们这一路表现很不错,又勇敢又有毅力……将来革命发展了,要做的事情多得很。这一路,看得出你们女同志能够和男同志同样过严格的军事生活,将来也可以和男同志一样担负重要的革命工作……”南昌起义军中的女兵们用不断向困难作斗争的决心和勇气、对革命的一片赤诚真心,为第一支人民军队的诞生增添了新鲜力量。

据《解放军报》

陈寅恪出考题

1932年,陈寅恪受清华大学中文系代主任刘文典之请出国文考试题。

他为入学考生出的题目是《梦游清华园记》,另加对对子,题目有三:“孙行者”“人比黄花瘦”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;为二三年级转学的学生出的对子是“莫等闲,白了少年头”;为研究生考试出的对子是“墨西哥”。此举引起舆论沸腾。某生阅卷后大表不满,以“我也去”对“孙行者”,下注“老子不考了”以示抗议。某报以北平城东一间名为“清华园”的浴室来调侃此事道:“东城有一清华园,西城有一清华园,梦游要仔细,莫把澡堂当学堂。”

为此,陈寅恪在《清华暑期周刊》第六期上发表《答记者问》,又撰《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》,解释出题含义。33年

后的1965年,陈寅恪还为《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》补写后记,以申前义。他认为:“(甲)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,能否知道分别虚字及其作用……(乙)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,能否分别平仄声……(丙)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……(丁)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思想条理。”

作家端木蕻良是当年的考生,几十年后他回忆,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,他对了“枣花未落桐叶长”;“孙行者”他对了“花和尚”。他认为这种考试方法检验了他的语言能力;于同年考清华的周祖谟和张政烺,当时对“孙行者”的对子都是“胡适之”,陈寅恪阅卷时大为赞赏,传为佳话。周祖谟后为北大教授,张政烺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,主要研究古文字、古文献。 崔鹤同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